

“身体政治”之下的女性农民工*

王 华

(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 “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长久以来吸引着各界的讨论, 而更为弱势的女性农民工却很少被给予特殊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对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田野调查, 来展现女性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状态。本文认为, 一些制度性因素实际上无视女性农民工的公民权利, 致使她们劳务市场这一制度性空间里遭受各种歧视与攻击。但女性农民工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周旋与反抗。她们所反抗的是政府治理术里不公平的部分和男权主义宰制下的身体政治。

[关键词] 女性农民工; 身体政治; 抗争; 户籍制度

问题的缘起

劳务市场的外面, 身着蓝色棉衣、外套一件枣红色的连衣围裙的志英, 拖着锈迹斑斑的行李车不断徘徊, 寻找着一丝的就业希望。奇怪的是, 当有雇主的汽车在她身旁停下时, 她却不像其他男性农民工那样蜂拥而上, 而是静静地站着, 等待着雇主的主动搭讪。“像我这么大岁数的, 要的人也少。如果他(雇主)相中我的话, 肯定会来找的。”看来, 志英已经对这一切场景早有体察, 也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有所领悟与定位。作为一名离开村庄的女性农民工, 如同其他打工者一样成为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中的一分子。这些流动的女性农民工因其庞大的数量, 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 并成为一幅倍受世人瞩目的社会景观。学术界也因此有了些关于女性农民工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

尽管许多研究成果在视角上存在种种差异, 但它们仍然具有共同之处: 一方面, 力图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语境中, 探索打工妹群体在工作生活环境中所遭受的体制性的压迫和剥夺。这些研究皆向读者展现着她们艰难的生存样态和处于底层边缘的社会地位, 并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群体被国家、市场, 以及传统文化所利用、剥夺, 甚至抛弃、淘汰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 尽管打工妹群体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底层边缘, 但研究者们都采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建构打工妹群体的主体性, 并借此反映出该群体在社会结构与现行制度的夹缝中, 如何进行抗争。但是, 笔者注意到, 有关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年轻的打工妹范围之内。这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境遇的整体理解与思考。

*[基金项目] 江苏省 2010 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CX10B_018R);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2010SJD840002); 南京大学社会人文科学重点学科基地基金项目; 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2010CW08)阶段性成果。

本文初稿曾在 2011 年 9 月 16 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承办的“南京大学—京都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坛”上宣读。衷心感谢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范可教授的精心指导, 感谢杨德睿副教授、张玉林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马惠娟以及来自 Kyoto University 的 SAKURADA Ryoko、NAKAYAMA Taisho 两位博士提出的宝贵意见。

作者简介: 王华(1980—), 男, 汉族, 江苏海安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生, 研究方向: 社会人类学。Email: wangh8012@gmail.com。联系地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南园陶二 316 室, 210093。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国家权力主宰之下的女性农民工并非只有借助“劳动场景”才能被加以呈现和揭示,还有其他能够对其进行分析的场域。本文通过笔者在农民工劳务就业市场进行的田野研究为个案^[2],描述在劳务市场应聘的中年女性农民工被性骚扰和侵犯的生活经历。并将女性农民工置于“身体政治”的话语中,重点关注在结构性暴力中的女性农民工,考察她们如何在空间性隔离体制下被关注、利用和控制。而来自男性农民工的性骚扰与侵犯,又是如何使她们的身体遭受到活体试验般的恐惧与疼痛。笔者还将揭示她们如何通过利用自己的身体斡旋于男性之中,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驾驭劳务市场。笔者将此考虑为来自底边的一种抗争。

社会科学里的“身体政治”话语

“身体政治”是一个涉及实践和策略的概念——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借此规训人类身体,同时个体及其身体对社会控制做出反抗。它涵盖了政府与法律中的制度性权力,经济生产中的纪律处分权力,消费中的自由选择权以及谈判中的个人权力等等。当个人和行动设法缓减强加在他们身体上的这些权力时,身体政治便由此呈现。^[3]因此,身体政治是一个围绕着身体、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研究领域。^[4]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学者们对此讨论激烈。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讨论了身体政治的内涵与社会意义。韦伯(Max Weber)从宗教禁欲的视角,来探讨身体控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在讨论宗教禁欲时,他认为修道院的纪律已经逐步转移到了私人家庭和一般工厂,此间的所有人都在为履行日常生活的身体控制而不断努力,并承认性欲的节制是资本主义理性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对身体,包括性欲的克制。^[5]宗教的禁欲主义对信徒的身体固然具有强烈的约束力,但这远远没有政治权力对身体的管理与控制来得那么淋漓尽致。

在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微观权力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至身体的每一个毛细血管,使身体全面笼罩在一个知识教化和权力干预的区域内。他的《规训与惩罚》作为一部惩罚控制史,力图表明权力由对犯人身体之公开的暴力惩罚逐渐被对驯服身体的管理和控制所取代。福柯关注政治肉体,视之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的技术手段或中介,并借此把身体当作实践对象来干预、管理、控制甚至征服。他的论述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当中的各种组织和制度都围绕着身体展开争斗,都对身体进行随心所欲地规划、摆弄。^[6]在此基础上,《性经验史》以性为材料和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身体、真理和权力的关系,亦即考察在人类历史中“性”是如何被权力操纵、利用以至于改变的。^[7]

应该看到,福柯的生命政治强调的是权力对个体身体的控制、管理与利用关系,尚未上升至司法层面来考察这些关系。因此,他也就无法在权利与法律等领域对其进行详尽讨论。这个空缺却给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创造了自己学术的用武之地。在阿甘本那里,赤裸生命以及出生—身体—权利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他揭示身体政治的出发点。他认为身体不只是权力的干预之对象,而且还是个人权利的诞生之源——当身体进入到国家的政治司法视野时,便会催生着现代民主机制的诞生。不过,在另一种情况下,尤其是赤裸生命进入到集权主义政治的语境时,国家社会主义的优生学、对“没有价值的生命”的肉体消灭以及法西斯医生对赤裸生命的残忍试验也就获得了被彻底认识与揭露的可能性。^[8] (p217-251) 因此,这种对赤裸生命的照管、利用、控制甚至杀戮的行为完全是根据当时政治组织的意图所使然。

亨利（Nancy M. Henley）从女性的视角，对空间、时间、环境、语言、举止、触碰、姿势、眼神接触、面部表情等九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认为对于大规模社会控制和小范围的人际管制而言，非言语的身体行为是其最主要的手段。以权力、性和身体政治为研究主题，亨利进一步地指出人们日常生活互动的细微方面实质上都是微观政治的表达，而这些表达用以维护现状并构成某些重要却被忽视的社会控制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亨利的研究拓宽了身体政治的研究视界，启发了后续的身体政治研究。^[9]

上述的韦伯、福柯、阿甘本以及亨利等人有关身体政治的话语存在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身体与宏大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都在探讨与身体有关的政治权力与现代性之理性。韦伯重点关注宗教教义对身体欲望的约束，以此产生对资本主义兴起的影响；在福柯那里，微观权力机制通过知识规训深深地渗透至身体中，将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和制度的意图借助对身体规划与控制呈现出来。而阿甘本将身体的讨论提升至国家之权利与法律层面，在出生与身体/权利的关系中把身体政治剖析得淋漓尽致。亨利从女性的视角阐述身体是微观政治用以维护现状并构成某些重要却被忽视的社会控制的表达。然而，笔者注意到，也许由于这些学者重点关注的是对政治权力、现代理性等方面的阐述，对他们而言，身体只是一个研究的手段、材料或途径。因此这些讨论都把身体置于一个受制于机构控制的被动境地，并作为某些权力与制度的实践对象加以对待，形成了一种“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论”^{[10] (p52)}，而对身体作为抗争主体及其主体能动性的研究未予以关注，从而难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身体政治背后隐藏的另外一种意蕴。

与上述学者不同，特纳（Bryan S. Turner）和希林（Chris Shilling）两位学者在有关身体政治的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特纳在其《身体与社会》中将身体融入有关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重新思考古典的、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被当作身体问题加以研究；在讨论父权制时，特纳从基督教神学对待肉体的态度出发，追溯了父权制的起源；通过分析西方社会饮食规定技术的发展，充分说明福柯研究身体纪律的方法；最后考察了身体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病痛和疾病的本质。总之，特纳通过上述议题的讨论回答“身体是什么”的社会本体论式的问题，以此展现缺乏身体社会学这一状况，激起学界对此进行必要的研究。^[11]希林从各相关领域全面展示有关身体的研究成果和主要视角，重点分析了“高度”现代性中身体、自我认同与死亡之间的关系，指出身体逐渐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并提醒后续的学者：无论在自我认同的探究中，在不平等的建构与维护中，还是在社会类型的构成与发展中，身体均具有重要的关联意义。^[12]

另外，上世纪中期以来，女性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向激进主义，从存在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过程中，皆视“身体”为性别政治的权力场域。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认为过分地囿于权力与身体，尤其是与性的关系，往往陷入某种非政治化倾向，成为男权主义阴影之下的附庸，使其失去女权主义的旗帜。因此，他们的理论洞见与学术观照对后面的学术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作用。

上述学者的有关话语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洞见。上世纪 50 年代确立的户籍制度，通过空间与距离的方式恣意地将农村和城市进行人为隔绝，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围墙”^[13]。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常常处在工厂管理制度的规训、甚至惩罚之下，剥夺了劳动阶级主人翁的主体地位，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资本，从事着异化劳动。这种“身体”在城市工厂岗位上的“在位”与社会身份为农业户口的“错位”状态，是影响中国公民无法拥有平等公民权利的主要因素。“农民工”这一称谓就足以说明这一特殊群体的尴尬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底边位置。

对于农民工群体中的女性而言，这种处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何以家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如同潮水般地流进城市，成为了制造业中蔚为壮观的主力军。而以临工为生的女性农民工的遭遇却与制造业里的打工妹大不相同。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这些近百个女性农民工大多已是40、50岁的年纪了。她们之所以来到农民工市场，主要由于夫妻离异或家庭暴力。来自巢湖的志英对笔者说：在二十多年前，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外村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并在次年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这是志英从父家嫁到夫家，迈出了女人成功的第一步。妇女生了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她在夫家的社会地位顿时会得到承认。^[14]然而，之后并非一帆风顺。她夫家一家人嫌弃她脾气急躁，又没本事不会赚钱，从起初的看不起她到后来的打骂，甚至虐待她。在一切都被“钱”侵蚀的年代里，志英成了牺牲品，只好选择离婚来躲避无休止的家庭矛盾。这种因为离异而出来打工的女性在劳务市场处处可见。用她们的话说，“有家的话谁还出来呀？”

家庭暴力也是女性农民工离家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自湖南的素梅就是因为不堪其害而从家里逃到南京打工。素梅告诉笔者，其丈夫原是一位退役军人，脾气暴躁至极，对家人的要求极其苛刻，稍微有点不顺心，则对家人拳打脚踢。她左手臂的伤痕就是因为丈夫赌博输了钱将怨气发泄至其身上所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广阔平台。因此，这些女性在家庭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无奈地选择离开。女性因反抗家暴从农村出走是对传统男权主义的家庭制度的挑战，农村妇女逐步从任人摆布的角色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主体能动性，积极地走向城市选择打工生活。由于治安部门通常对家暴不作为，因此出进城找工作对于经历了不幸的她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15]

然而，对于一个单身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来说，找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即使能获得一份工作，往往也是临时的，只提供基本薪水和食宿，其他的保障一无所有。她们所具有的技能 and 城市职位的要求存在着差距，一般只能找到一些家政、保洁、洗菜、洗碗工作。志英曾经应聘护理年迈老人的工作。但是刚工作几天，脾气古怪的老人说她为人不够乖巧灵活，对志英的活计也挑三拣四。雇主见志英无法让被照顾的老人满意，便在一个月后打发了她。而红云曾被一家私人幼儿园聘请去厨房洗菜做饭。这份工作的工作量比起工地小工要少很多，而且可以随便吃饭，她很满意。但是新的问题让充满希望的打工生活终结了。幼儿园辞退她的理由是，她只会做大鱼大肉的农村菜肴，不懂得幼儿食物营养的合理搭配。而且菜肴的口味浓重，不适宜幼儿的胃口。这些菜肴完全忽视了幼儿身体的健康成长，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该幼儿园的招生。

对于已过中年的她们来说，现在能找到的工作不过是洗菜、洗碗、打扫卫生之类。这正如C. Cindy Fan所言，城市的职位标准对求职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由农村进城打工的女性过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又没有经过职业培训，因此在整个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小。^[16]由于全球化、工业化的席卷，女性受到了更加不平等的对待，她们的经济收入、赋权、机会、能力以及安全感等面临着更大程度的体制性障碍，陷入贫困深渊的几率大增。^[17]失去工作的她们，只得回到劳务市场继续找工作。然而劳务市场并非应聘的乐土。来自五湖四海的特色人等皆汇集在此。其间也往往鱼目混杂，坑蒙拐骗、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等事件司空见惯，而令女性担心恐惧的性骚扰和性侵犯也屡见不鲜。

侵犯与抗争

在工作面临种种困境之时，处在劳务市场上的女性农民工的人身安全也越发令人紧张与不安。国家治理术把农民工与其家庭隔离开来，导致的后果是男性农民工与配偶、异性伴侣的分离，他们的欲望无法从正常渠道得到的满足^[18]。其结果一方面催生并繁荣了性交易市场^[19]，导致农民工感染 STD 和 HIV 的几率大增^[20]。另一方面，必定会对特定范围内的异性实施性骚扰甚至性侵犯^[21]。笔者调研的劳务市场就属于演绎着这些故事的特定范围。

由于形象好，五官长得端正，一些女性时不时地便被其他男性农民工调戏和骚扰。志英告诉笔者，曾有一次她所谓的“老乡”利用她在劳务市场旁边的饭馆里吃饭的机会，趁在她身上乱捏乱摸，还抱起来搂着亲嘴。但倔强的志英使劲儿反抗，并大声喊叫。没能得逞的“老乡”恼羞成怒，一把薅住志英的头发，把她重重地摔在地上，对着她的头一阵乱踢。还叫前来围观的人评理，诬蔑她借钱不还，想逃跑。直到现在，每逢变天或转季时节，志英的头部还隐隐作痛。“在南京我没有碰上过好人，我不喜欢南京。”志英的遭遇让人听起来就已经毛孔悚然了，而她的同伴红云却有着更可怕的遭遇。红云同样是离了婚，从皖北夫家出来打工的妇女。为了省钱，她放弃了投宿旅店，而选择在尚未拆迁完的破房子里将就过夜。半夜时分，两个男性农民工趁她熟睡之际，悄悄地溜进来，生猛地爬到她身上欲图占有红云。她不愿意并拼命抵抗。那两个男性农民工气急败坏地狠狠地揍了她。结果她的两个门牙被打掉了，一根手指也被砍断了。在其他人看来，这些事的起因是“谁叫她长得白呢？”

一个女人长得五官清秀、皮肤白皙，应该被认为这是上苍对她特别的眷顾，感到欣慰才是。然而，有些女性农民工却为此付出了泪与血的惨痛代价。这些被毒打、被性骚扰与性侵犯的遭遇在劳务市场的女性农民工身上时有发生。相形之下，工厂女工之身体的痛楚^[22]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面对这些随时会出现的恐惧和危险，劳务市场上的女性无奈地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那样，个人首先对身体的基本能力与所处的环境有所熟悉，然后才能实践其身体的能力。^[23]为了生存和获得庇护，志英在劳务市场里找了一个“大块头”做相好。待业时，白天帮助他洗衣做饭，夜晚陪他睡觉。随后的日常生活便安静许多，再也没有人敢对她怎么样了，虽然偶尔会有来自“相好”的拳打脚踢。而红云白天在劳务市场里嗑着瓜子闲逛，并不刻意寻找工作。到了夜晚她便凭借出众的身体优势，利用男性农民工生理需要的机会，趁机顺势增加了自己的收入。更能吸引她的是，男性会“大方”地提供包括可口的晚饭、干净的床铺、洗澡热水等对待遇。这些附加收益使漂泊在外的红云多少感到一丝家庭的温馨与短暂的安全。但笔者注意到，红云并不主动寻找客户，恰恰相反的是红云挑选找上门来的客户——年老且有钱之农民工。用红云的话来说“晚上可以睡得安稳一些。”有钱人出手大方，绝不会只办事不给钱。在此，我们看到，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里，经济主义观念深深地影响着身临其境的每一个人，对身处在户籍体制、市场资本、男权主义和劳务市场之“底边社会”^[24]的女性农民工而言更是如此。

然而，不管是志英也好、红云也罢，这些女性农民工的身体并不是单纯地处于如福柯所言的被训练、被折磨、被强迫的位置上，^[25]而是具有主体能动性。她们通过自我的身体去利用、操纵、甚至控制围绕在她们身边的男性，男权宰制下的身体政治因此而遭到来自女性身体的抗争。笔者在调查中经常见到男性农民工为了女人而互相打斗的血腥场面。素梅阿姨向

我道出其中玄机。在市场内与其他男性发生冲突时，有“相好”的女性便马上跑去告状。于是，打架就在所难免了。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经问红云，“如果你被欺负了或被勒索了，怎么办呢？”红云看着我，信心百倍地对我讲，“谁敢？老娘找人砍他！”红云告诉笔者倘若遇到大事，她不会找市场里的人直接帮忙，而是叫市场里的人帮她到下面的街上去请打手，原因是要让对手慑于她的能量和势力。当然，这些激烈打斗的场面毕竟不是时刻发生的，更多的是她们会在待业的男性农民工中间穿往来梭，谈天说地，以期利用男性的遐想来为自己谋得一份晚餐或一件漂亮的衣服。

除了寻求保护之外，女性农民工还以身体为资本与雇主进行抗争。在田野中，笔者发现经常有雇主招聘夫妻工。这时，这些男女“相好”搭配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另外，有些雇主也不是省油的灯，往往招聘时开出的条件与实际的工作待遇完全不同。为了避免盲目的就业，许多女性会利用男性人脉资源找到相对“理想”的工作。当然，这些还不是最要紧的。倘若碰到欠薪的雇主，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往往落得自认倒霉的无奈境地。然而，劳务市场里的女性却并非逆来顺受、任人摆布。红云的姐妹亚芬的例子能够给我们展示这个抗争的力量。亚芬被雇主聘去给工地装修的工人煮饭，口头协议是一天 50 元，包吃包住。但一个多月后房子装修好了，雇主只发给她 1200 元，尚欠 850 元，亚芬追讨多次无功而返。誓不甘心的她说服了市场里对她“有意思”的几位男性农民工，带着榔头、斧头、凿子等劳动工具上门讨薪。雇主被这出乎意料的阵势震住了，最终将所欠的薪水付清。然而，亚芬付出的代价却是满足他们对其身体的渴望。

我们可以看到，俨然种族隔离一般的户口制度无情地将农村到城市的打工者的公民权利彻底剥夺，使其成为只剩下身体作为最后一份私产之赤裸生命。在工作无望、生活艰难的境遇下，她们只剩下一副让男性产生无限遐想的身体而已。在一切都商品化、将一切都货币化的畸形年代里，她们仅仅是为了能够生存得安全一点、安心一些，而将自己的赤裸身体当作了主人，驾驭着劳务市场的整个夜晚。女性在自身身体受到难以磨灭的规训、压迫甚至性侵犯的同时，又游刃有余地利用自身的身体，达到其利用、控制男性甚至抗争的意图。

简要的讨论

身体作为个人最后一份私产，连一个穷困潦倒的乞丐都会拥有，并能对其驾驭自如。^[26]
^(p23)然而在权力和资本的合谋下，“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27] (p27)}。无论是志英、红云还是素梅、亚芬，她们所经历的遭遇比产业工人来的更加隐蔽，她们是一群被户籍制度、市场资本以及男权社会压迫、剥夺、侵犯的赤裸生命，是现实活剧里的一号主角。在此，我们看到了在工厂之外的劳务市场上，“阶级的性别化过程”^[28]和“社会抗争主体的新型的阶级基础”^[29]逐渐显现。虽然福柯的权力与性的关系被女权主义解读为具有某种非政治化倾向，使之失去女权主义的旗帜。^[30]然而，从劳务市场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并未看到一个采取政治行动的女性群体，我们所看到的，仍然是处于福柯的观照中演绎着权力和反抗故事的群体。

中国近些年的城市化进程出现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然而，城市的管理者利用户籍制度把进城的外来者加以限制，将他们污名化为素质低下的群体。无论农民工流动到哪个城市，国家的户籍制度与城市管理政策早已将他们的公民权利在涌入工厂之前，就从根本上予以剥

夺,使之转变为只拥有劳动力的躯体和赤裸生命,一个活脱脱的生物性存在,任由权力与资本“合法地”挑选、捶打、形塑、利用甚至侮辱蹂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类属农业户口的人无法获得城市合法定居的权利,也享受不了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与服务的权利。但同时他们从事的都是需要体力的廉价的“险、脏、苦、累”工作,并处在“招来挥去”的弱势地位。时至今日,虽然这一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用工制度。

这一切的事实表明,同样处在一国范围内的公民,却不能获得同等的公民权利,甚至于生命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令人不得不怀疑马歇尔(T. H. Marshall)所断言的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必定会催生并强化一个国家国民的公民权。^[31]当然,笔者并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这并非表明我们可以忽略那些为此做出巨大贡献与付出巨大代价的农民工群体。本文透视劳务市场中女性农民工的底层边缘的生活之意义在于:提醒当政者在追求效率优先的同时,也须关注、尊重和保护农民工,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的利益,给予他们公正平等地享受公民权利的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承受转型阵痛的折磨,更不可使他们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牺牲群体。

参考文献:

- [1]请参见:外来女劳工课题组.谭深执笔.外出打工与农村及农民发展.[J].社会学研究. 1995(4). 唐灿,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J].社会学研究, 1996(4). 佟新,社会结构与历史事件的契合——中国女工的历史命运.[J].社会学研究. 2003(5). Lee, Ching Kwan,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朱虹,身体资本与打工妹的城市适应.[J].社会. 2008(6). 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J].社会学研究. 2009(2). 参见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 2005(2);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M].任焰译,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2007. 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2]有关劳务市场的概况,请参见王华,空间的底边与底边的空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5).
- [3]参见 <http://encyclopedia.jrank.org/articles/pages/6016/Body-Politics.html>.
- [4] Michael Ryan and Avery Gordon (ed.), *Body Politics: Disease, Desire and the Family*. Westview Press, 1994.
- [5]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7]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8]阿甘本,生命的政治化,严泽胜译,引自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9]Nancy M. Henley, Englewood Cliffs, N.J. *Body Politics: Power, Sex,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Prentice-Hall, 1977.
- [10]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1]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 [12]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3] Kam Wing Chan, *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Reinterpreting Urbanization in Post-1949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94.
- [14]费孝通,2002,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
- [15]祝平燕,周天枢,宋岩,2007,女性学导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16] C. Cindy Fan,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C. Cindy Fan, “The Elite, the Natives, and the Outsiders: 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in Urban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2, No. 1 (Mar., 2002):103-124.

- [17]侯静娜,2006,全球化对女性的影响.[J].国外理论动态,第1期.
- [18]参见 Yang, X., V. Derlega, and H. Luo. "Migration, Behavior Change, and HIV/STD Risks in China." *AIDS Care*, 2007, 19(2):282-88. Yang Xiushi and Guomei Xia,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STD/HIV Risky Sexual Behavior: A Population-Based Analysis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China". *Social Problems*, Vol. 55, No. 3 (August, 2008), pp. 322-346
- [19]李娟.小城镇女性农民工性服务研究——以L市Y区为例.妇女研究论丛. 2011 (1); 张晓红, 融入与隔离:从打工妹到卖淫女的角色转变.[J]. 青年研究. 2007 (1); Yang Xiushi and Guomei Xia, "Gender, Migration, Risky Sex, and HIV Infection in China".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Vol. 37, No. 4 (Dec. 2006), pp. 241-250
- [20] Li, X, Fang, X., Lin, D., Mao, R., Wang, J., Cottrell, L., Harris, C., & Stanton, B.. "HIV/STD risk behaviors and perceptions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2004)16, 538-556. Yang Xiushi.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the Spread of STDs/HIV in China: Is There a Lin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1 (Spring, 2004), pp. 212-235.
- [21]参见“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研究课题组”,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J].妇女研究论丛. 2009 (6); 唐灿,性骚扰——城市外来女民工的双重身份与歧视.[J].社会学研究, 1996 (4).
- [22]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M].任焰译,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2007.
- [2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24]乔健,底边阶级、边缘社会与阈界社会.载于乔健(编著)《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表》.[M].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07:14-33.
- [2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26]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27]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28] Lee, Ching Kwan,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29]参见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开放时代. 2005 (2);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形成.[M].任焰译,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2007.
- [30]参见:张喜华,后现代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0 (5);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31] T.H.马歇尔,《公民权与社会阶级》.引自安东尼·吉登斯.公民权与社会阶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Female Migrant Workers and Body Politics

Wang Hua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blem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a perspective of body politics. Drawing on fieldwork I have carried out in Nanj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fold the situation of female workers as rural migrants to live in the urban Nanjing.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rights of their citizenship are deprived and thus are just as body to suffer from sexual harassment and assault in the labor market,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 space highly institutionalized. Thes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in the meantime are able to manage and even control men who are close them to resist the male dominating body politics, which was, to an extent, produced by the syste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Keywords: the Female Migrant Workers; Body Politics; Struggl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